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四九期 ——  
(二〇〇八年五月五二十一出版)

---

本期目录 (zk0805f)

【本刊专稿】	“赵永夫事件”浅析——洗恒汉回忆录补正之二	余汝信
【人物春秋】	我所知道的戚本禹	孟祥才
【回首文革】	“文革”前夕的《人民日报》	钱 江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本刊专稿】

### “赵永夫事件”浅析——洗恒汉回忆录补正之二

• 余汝信 •

“赵永夫事件”，根据发生的日期，又被称之为“青海二·二三事件”。它是文革中震惊全国、被当时的中央定性为对内“篡夺军权”、对外武装镇压造反派的“反革命政变”事件。对此一事件，文革中及文革后各方的评价迥然不同。本文为对该事件过程的一个要点剖析。

#### 一、青海省军区内的“反革命政变”

洗恒汉说，1967年“11月22日，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因召开省军区常委会，讨论支持西宁地区群众组织‘八一八’的问题，而受到另一派群众组织‘捍卫队’的围攻批斗。当时，造反派（包括一些军区机关干部）把省军区党委常委们都拉到一起，强迫表态，并野蛮地动手拔领章、帽徽、罚跪武斗，只有副司令员赵永夫一人表态支持‘捍卫队’，因此受到造反派们的欢迎，并享受坐在椅子上的待遇”（1）。显然，洗的立场是站在刘贤权一边的，并且认为赵在常委中是少数派。另洗文中的“造反派”，应解读为保守派。

而据安绍杰（刘贤权夫人）主编的《刘贤权将军》中更详细的说法，这一天应为1月23日。该书称：“1月23日刘贤权主持召开了省军区常委会，学习中央决定以后，于下午6时，

讨论确定支持左派群众的表态问题。一致通过支持‘八·一八’群众组织，上报了兰州军区、党中央和军委。可是这表态消息刚一公布时，就立即引起了另一派群众组织的强烈反对，而且随即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激烈行为。当晚9时许，另一派造反者冲进省军区机关揪斗刘贤权，一下扒掉了他的帽徽领章。与此同时，省军区机关内部也出现混乱局面，一些人迎合军外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逼迫刘贤权和常委撤销军区常委的决定。这样一来，当地派性斗争的形势就更加激烈，局势更为混乱。为扭转这一局面，刘贤权于当夜零点再次召集常委紧急会议，商议举措，遂决定把支持一派群众改为支持一切革命左派”（2）。根据上文，支持‘八·一八’的表态，是刘贤权主持的常委会“一致通过”的（既然“一致”，也就包括了赵永夫）。文中“另一派造反者”，亦应解读为保守派“捍卫队”。

文革后的青海省委，对这一天在省军区发生的事是另一说法：“1月23日，中央发出《关于支持左派革命群众的决定》之后，当天下午，刘贤权再次召开常委扩大会，继续讨论谁是左派问题，并进一步提出支持‘八·一八’的七条理由，其中特别强调：‘八·一八’既反省委又反王昭，应当支持。多数常委为避免造成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不同意刘的意见，而一致同意交机关干部讨论后再决定支持准。会后，刘贤权却背着其他成员和机关干部，偷偷派他老婆去向‘八·一八’表态支持，要他们向军区‘报喜’，并私自指示省军区文革办公室通知驻军部队要一边倒，坚持支持‘八·一八’。由于刘贤权的阴谋活动，造成了群众组织之间的严重对立。其他群众组织到军区质问刘贤权为什么不支持他们，群情激奋，形势极为混乱。省军区机关和驻军部队为了稳定局势和维护西宁驻军部队的团结，一致要求军区党委纠正刘贤权的支派分裂活动”（3）。根据该说法，多数常委不同意刘的意见。“其他群众组织”，应指保守派“捍卫队”。

两种不同的说法，孰是孰非？

据查证，当时的省军区党委常委为：第一书记杨植霖（省军区第一政委，省委第一书记兼），第二书记王昭（省军区政委，省委第二书记兼），第三书记刘贤权（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省军区司令员），副书记王文英（省军区副政委），常委曾征（副司令员）、赵永夫（副司令员）、刘斯起（副司令员）、吴士杰（副政委）（4）。杨植霖、王昭是省委领导兼职并已受到冲击不能与会，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常委至多六人（据另一材料王文英、吴士杰此时并非常委（5），应不确）。笔者认为，虽然刘的资历在与会者中是最老的，地位是最高的，但他的意见在常委（或常委扩大会议）中未能形成多数，常委中“一致通过支持‘八·一八’群众组织”的说法，很值得怀疑，支持刘的似乎只有并非常委的副司令员张江霖。支持保守派、在常委中地位、资历比刘贤权（1955年少将）、曾征（1955年少将）、王文英（1964年晋升少将）都低的校级军官赵永夫，却在常委会中掌握了主导权。而这一现象也符合当时的一个普遍规律——在全国省一级地方军事机关中，支持保守派的力量占优势。象刘贤权这样支持造反派的省军区司令员，在全国确为凤毛麟角。

《刘贤权将军》一书接下来说：“从1月23日起，刘贤权的工作开始受到限制。在2月15日至3月8日这段时间里，刘贤权的行动就完全失去了自由。他这位老红军被造反派（应为保守派——笔者注）揪到军区机关批斗、毒打、隔离、武装看押、抄家受到羞辱”（6）。

至今我们尚未能得到答案的是：据冼恒汉说，赵永夫整倒刘贤权，“事先事后都未向兰州军区请示报告，完全是一种非组织活动，性质非常严重”，既然没有上级的支持和同意，赵永夫哪来的劲头和底气？

## 二、《青海日报》社的枪声

早于1967年1月12日，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青海“八·一八红卫兵司令部”

等二十七个造反派组织，即联合接管了《青海日报》。次日，这些组织称：决定暂时封闭《青海日报》，在封闭期间，将以特刊形式印发新华社播发的重要新闻（7）。

1月29日，‘八·一八’造反派宣告夺取了青海省委、省人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以及其他一切权力。该夺权并未得到中央的承认。

2月3日，以赵永夫为核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宁地区部队联合指挥部”动用250多台战备车辆，进行“支持革命派，镇压反革命”的武装游行。公安机关同时将从“八·一八”组织中逮捕的几名“反坏分子”，游街示众。

2月14日，赵永夫等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名义发布公告称：《青海日报》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的操纵下，歪曲事实，制造谣言，进行虚假的宣传报道，欺骗中央，欺骗青海省广大革命群众，对青海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决定自即日起，对《青海日报》社实行军事管制。是日，部队包围了报社，要求报社中的造反派组织撤离，遭到拒绝，双方僵持九天九夜。

冼恒汉在《风雨八十载》中称，赵永夫曾多次电报请示兰州军区，要用部队强行接管报社，兰州军区态度明确，坚决不同意（8）。令人不解的是：赵永夫作为下级，为什么可以对兰州军区的指示“根本不予置理，仍一意孤行”？

2月23日，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发布通令：“立即取缔青海省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对该反革命组织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

冼恒汉称，赵永夫“于2月23日晨亲自指挥部队，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并截断了与外地的一切通讯联络系统，还采取措施，断绝了由西宁通向兰州、河西走廊的公路交通，不准一切车辆通行”，“23日下午1时，赵永夫下令部队向阻拦的群众开枪，这样，一场流血惨案终于发生”（9）。

文革后官方编纂的资料则称：“2月23日，报社内外的人越来越多，在局势异常混乱的情况下，部队战士不慎枪支走火，误伤了自己的战士数人，误认为是占据报社的‘八·一八造反派’先对外开枪射击，遂导致了部队开枪。部队现场指挥所的负责人虽未下令开枪，但在部队开枪后，没有采取果断制止措施，以至酿成‘二·二三’流血事件（注：死伤群众347人，其中：亡169人，伤178人）”（10）。

冼恒汉说赵永夫下令开枪，文革后的青海官方称赵未下令开枪，又孰是孰非？

一位现场目击者（报社女工作人员）的回忆可能更客观一些：“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晚上，在军区政治部工作的一个熟人悄悄透信给我，要我第二天早上切勿再去报社，那里将有重大行动。我立即意识到即将发生流血事件。第二天清晨，也即1967年2月23日，我刚起床，就有一个同志神色仓皇地来我家告诉我，从北大街通向报社印刷厂（那时报社人都在印刷厂上班）的北门坡已经实行戒严，禁止人车通行。我急忙洗了把脸，随来人一起疾行至北门坡想看个究竟。在离北门坡大约还有50米的地方，就已感觉到气氛异常。坡上坡下布满了武装岗哨，战士们个个表情严肃，严密监视着周围动向。坡下通往报社的马路已被机枪严密封锁，除非有当时的特别通行证，否则，任何人休想通过。我和一些人只得站在坡头的封锁线外，挤在人群中踮脚翘首向下遥望。大约上午10点钟光景，报社方向忽然枪声大作，它告诉人们镇压行动确已开始了。我的心情不知为什么一下变得沉重起来。……我与‘造反派’虽格格不入，但他们

中真正的坏人毕竟是极少数，尤其是那些数以千计的工人群众，他们中的大多数自以为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日夜守卫在报社。子弹无情，究竟打死了多少人，其中是否有我熟悉的？为了了解确切情况，枪声一停，我便随着人流抄小路（小西门的城墙缺口）涌到报社印刷厂附近，这里正是多日来两军对垒的地方。我踮脚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只见一排排尸首倒卧在血泊之中，沾满血迹和尘埃的衣服、鞋、帽，散落得到处都是，有的挂在树梢上，有的飞到低矮的屋顶上。可以想见那些手无寸铁的‘造反派’，一旦看到子弹真的向自己射来时，是如何地惊慌失措。我万没想到和平时斗争竟会如此残酷！”（11）

### 三、谁说“打得好”？林彪还是叶剑英？

冼恒汉说，开枪之后，“赵永夫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很快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了加急电报编造假情况。晚八时许，有位军委领导给赵永夫直接打来电话，称赞‘打得好，是一个很漂亮的仗’，‘军委支持你’，并要他‘彻底肃清残余的反革命’。赵永夫接电话后，对别人说是‘林副主席’给他打的电话”（12）。

所谓“有位军委领导”，冼其实指的是叶剑英。冼的说法从侧面证实，赵永夫与北京军委有着直接的联系。这种联系，窃以为不是以省军区的名义，更不是以赵个人的名义，而是以赵可以直接控制的“驻西宁地区部队联合指挥部”名义。我们没有可靠证据的是，这种联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否从在支左问题上与刘贤权有分歧及至限制刘的自由时就已经得到军委的默认和同意？这倒可以解释赵为什么从那时起就底气十足。而这种联系，是刻意绕开倾向于刘贤权的兰州军区的。

在“二·二三”以后一段短时间内，赵永夫仍然得到叶剑英等的肯定。惟中央的态度，在三月初发生了变化。冼说：“3月6日，总政电话通知刘贤权、张江霖去北京，当时是全副武装押送的。3月8日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由于并没有说明来干什么，刘贤权、张江霖被蒙在鼓里，揣测不安地度过了十几天”（13）。张江霖本人的回忆说法有所不同：“3月8日，刘贤权和我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第三天，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来看我们，一见面就说：‘你们受惊了，到北京就自由了，好好休息！’”（14）。惟中央找赵永夫的对立面到京，是否对赵的一面之词已产生疑问？

3月11日，毛泽东、林彪分别批示，要求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缘由据说是听了中央文革的反映。据称，毛的批示是：“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15）。3月13日、21日、23日及24日，中央有关负责人四次接见青海党、政、军有关领导及群众组织代表以调查了解基本情况，其中又以以后两次规格最高，后两次，周恩来均出席。

3月24日（冼恒汉回忆误为3月29日），在调查开枪后军委来电一事时，叶群责问赵永夫：“你还说林总来电，你还感动得满脸流泪，什么时候给你的来电？”赵：“我接电话，问是不是林副主席，对方说是。”叶群：“林彪同志没有打电话！林彪同志三个秘书一个也没有接到电话，二十四日听到此事，毛主席、林总非常气愤，下令调查此事。”杨成武：“纯粹是造谣！为什么造谣？”戚本禹：“当面造谣！”杨成武：“完全是造谣！没打嘛！为什么说打了？”（16）

“军委来电”与林彪无关，当时任林秘书的张云生的回忆可作旁证：“在西宁的街头上，很快出现了这样的大字标语：‘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林彪听讲这些情况后，还是无所表示。就连那个误传的‘林副主席来电’，他听后也只是一笑了事”（17）。

而与叶剑英有关的依据，有近期官方编纂、公开出版的《叶剑英年谱》。其1967年2月23日条目提及：“在电话中听取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关于对冲击《青海日报》的造反派的处理情况报告后，肯定了部队的做法。三月，中央文革抓住这一事件大做文章，把是非完全颠倒过来，将赵永夫逮捕，并逼迫叶剑英多次检讨”〔18〕。

四十年之后，《叶剑英年谱》的作者重新肯定了开枪的做法，倒是“把是非完全颠倒”了。

王力在回忆录中谈及青海问题时说：“青海出了个刘贤权，是军区司令员，一开始就支持造反派。后来，被赵永夫（副司令员）抓起来。副司令员抓了司令员。赵永夫开枪镇压群众，最早汇报到林彪那里，林彪讲‘打得好’。后来翻过来了，中央把赵永夫抓了，刘贤权抬起来了，成了了不起的人物，这时又说‘打得好’的话是叶剑英讲的。林彪打倒后，赵永夫升了官，可是一查档案，‘打得好’是林彪说的，赵永夫又降了官，现在也不得意”〔19〕。在“打得好”是谁说的及赵永夫以后的际遇问题上，王力所说与事实完全对不上号。

#### 四、中央的调查与《决定》

3月11日毛、林批示之后，中央已着手调查了解了“二·二三”前后的大体情况。在3月24日晚至25日凌晨2时半的会议上，在周恩来等的严厉质问之下，又再查清了“二·二三”当天的一些细节〔20〕。

##### 1、谁决定武装镇压？

康生：你们的指挥部（注：指驻西宁地区部队联合指挥部）什么时候成立的？

张晓川：2月18日。（注：张晓川时任驻西宁的总后青藏办事处〔代号后字205部队，军级单位〕副主任，联合指挥部成员，据康生了解，组织指挥部是张先找赵永夫及驻西宁的陆军第五十五师。）

周恩来：嗯？

张晓川：是1月18日。

康生：那天你讲的是刘司令员不能工作，不要组织指挥部，可现在你讲，1月18日就组织了。

周恩来：23日武装镇压，你参加了没有？联合指挥部讨论了？

张晓川：讨论通过了。

##### 2、现场谁指挥？

周恩来：谁指挥？

张晓川：用卫戍区司令部名义。

周恩来：现场上谁指挥？

张晓川：赵副司令员、陈师长。（注：指赵永夫、青海省军区独立师师长陈明友。）

3、报社内的八·一八有没有枪支？

周恩来：你们就是想找借口镇压，镇压时下那么大的毒手。报社有枪，赵永夫你有什么证据？

赵永夫：……

周恩来：简单点，你的报告上都有。

赵永夫：以前了解有枪。

周恩来等：现场有没有？

赵永夫：……（回答文不对题）。

康生：你就回答有枪没有？

陈伯达：就说有、没有。

赵永夫：当时没搜出来。

……

周恩来：全部把他们包围起来了，你还没搜出来！（周愤怒地站起来），除非你伪造假枪！（注：原文如此，似应为伪造假象。）谎报军情，欺骗中央！

4、赵永夫有没有下令开枪？

赵永夫：不叫打，但管不住。

5、赵曾在京西宾馆介绍经验

叶群：前几天在京西宾馆介绍经验是你，有声有色，全部功劳都是你的，现在怎么都没你的事？推得光光的。白纸黑字，不知道？

会议最后由周恩来宣布结束调查，并即场宣布了青海问题的处理办法。处理办法能够即场迅速宣读，可见中央（包括毛、林）在这一次会议前已形成了统一的框架性意见。周并命令卫戍区人员将被宣布隔离受审的赵永夫、隔离反省的张晓川、王昭三人押出会场。

周恩来宣布并于当天形成正式文件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称：

“根据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三月十一日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的批示，经向各有关方面进行了反复调查，青海问题的实质已经基本清楚：

第一，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

第二，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〇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

第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现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支。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亦未搜到一支枪。

第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根据这种情况，现在决定处理办法如下：

（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

（二）除独立师、独立团归刘贤权司令员指挥外，八〇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二〇五部队，在处理青海问题上，也统一由刘贤权司令员指挥。

（三）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月二十三日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川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对负伤的群众，要负责进行治疗。因为这个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干部，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

（七）赵永夫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21）

## 五、叶剑英与对赵永夫结论的变化

在“青海二·二三事件”之前的2月9日，经毛泽东同意并修改定稿，中央军委曾发布过《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规定》第四条称：“对杀人、放火、放毒、抢劫等现行反革命分子，确定查明无误者，如敌人拒捕、顽抗和武装暴乱，在说服无效时，可开枪镇压”（22）。说是不准任意开枪，但这一条其实还是为开枪留了一个口子，提供了一个借口。“青海二·二三事件”是否有受到其“启发”的因素？

4月6日，中央军委再发布经毛审阅修改后的《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十条”），内称：“（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吸取了“青海二·二三事件”的教训，这一条将2月9日《规定》有关开枪的口子封死了。该命令第八条还点了赵永夫的名：“对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23）。

文革结束后，对赵永夫的结论发生了极大变化。1978年8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总政治部《关于赵永夫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和处理意见》（24）。以冼恒汉的说法，

《处理意见》的出台与叶剑英的态度很有关系。

总政的《处理意见》称：“一九六七年二月，西宁驻军‘联办’领导小组在支左工作中，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执行中央、中央军委的规定，将青海革命群众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确定了‘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调动武装部队夺占‘八·一八’掌权的《青海日报》社，导致部队开枪打死打伤群众三百四十七人（亡一百六十九人，伤一百七十八人）的严重事件，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造成‘二·二三事件’的直接原因是‘联办’领导小组取缔‘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和武装夺占报社的错误决定与行动”，“赵永夫同志身为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联办’副组长，积极参与了夺占报社的策划，并且是夺占报社部队的组织者和现场主要指挥者，对此事件应负主要责任”。

《处理意见》不公平地将“二·二三事件”的责任分了相当一部分给刘贤权：“刘贤权同志进行支派分裂活动，致使‘八·一八’群众组织与西宁驻军严重对立，这与‘二·二三事件’的发生，也有重要关系。刘贤权同志对这一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中央、军委在转发总政《处理意见》的通知中称，同意总政《处理意见》的请示，并称：“‘二·二三事件’的后果是严重的，但考虑到赵永夫同志已隔离受审十年，对错误已有认识，同意给予赵永夫同志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原级不动，按正师职予以安排”。既然撤销了党内外职务，又如何“按正师职予以安排”？文字前后矛盾，难以理解。

文革期间，叶剑英在稳定军队、抵御极左派以至粉碎“四人帮”斗争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堪称之谓厥功甚伟。惟称道赵永夫等谎报军情、以武装力量镇压手无寸铁的群众、造成巨大群体性伤亡的围攻《青海日报》社行动，诚为一大失察！叶有大功，未许否认。惟有功，并不能抵过；有过，也不会掩功。功是功，过是过，功过是非，不可混淆。（2008年5月）

注释：

（1）（8）（9）（12）（13）洗恒汉：《风雨八十载》（洗玲的博客，<http://9link.116.com.cn/hode/29882>）。

（2）（6）安绍杰主编：《刘贤权将军》（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页218—219。

（3）《中国共产党青海省组织史资料》（西宁，1995），页533所引述1978年12月11日《中共青海省委文件》青发（1978）334号、青军（1978）430号。

（4）同（3）书，页128。

（5）《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五卷（北京：长征出版社，1995），页440。

（7）本节内容，主要根据中共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青海党史大事记》（西宁，内部发行，1997），页166—169。

（10）同（3）书，页124。

（11）王秀明：《青海“赵永夫事件”亲历记》（太原：《文史月刊》2001年第9期）。

（14）同（2）书，页336。

（15）张云生：《林彪秘书回忆录》（香港：存真社，1988），页74。

（16）（20）《中央首长关于青海问题谈话纪要》（青海八·一八红卫兵司令部、井冈山兵团印，1967年4月）。

（17）同（15）书，页70。

（18）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页961。

（19）王力：《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页745。



(21)《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1967年5月),页319—324。205部队,即后字205部队,为总后青藏办事处的代号;8061部队,为陆军第五十五师的代号;8122部队,为国防科委第二十二器材基地的代号。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222。

(23)同(21)书,页122—128。

(24)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1978)50号,中共中央办公厅1978年8月18日发出。

~~~~~

## 【人物春秋】

### 我所知道的戚本禹

• 孟祥才 •

我开始知道戚本禹的大名是1963年在大学历史系读书的时候。那时他在《历史研究》杂志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轰动了史学界。他的文章气势磅礴，先声夺人，文字华美，酣畅淋漓，使历史系的青年学子佩服得五体投地。此后，凡见到他的文章，我一定仔细认真研读。1964年9月我考入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师从侯外庐先生读研究生，这时我才从所里同事那里知道戚本禹原在中央办公厅任信访科科长，后因发表几篇影响很大的史学文章，调到了《红旗》杂志编辑部工作。1965年底，我们这批1964年进所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自劳动锻炼的农村回到北京，这时，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已经在《红旗》杂志发表。这篇不点名地批判翦伯赞史学观点的文章在当时“极左”氛围越来越浓的时候自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几乎成为史学界人人必读的文章。第二年三月初的一天，当时历史所学术秘书室负责人酆家驹召集应永琛、朱大韵、李斌成、程喜霖和我五人开会，说是戚本禹找到历史所领导尹达，要求历史所找几个人到《红旗》杂志帮助他工作。经组织研究决定，派我们五个人去。酆说：“戚本禹这个人说话很冲，你们要小心谨慎。”

第二天上午，我们五个人一起到了位于沙滩的《红旗》杂志编辑部。这里原是老北京大学的校园，临街的红楼曾是李大钊、毛泽东工作的地方。大院北部的一座楼的墙壁上还依稀可见用红漆写的“民主广场”四个字。当时《红旗》杂志与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两个单位在同一座楼上办公。这座楼是新建的，共五层。大概为了与前面的红楼协调，这座砖石结构的大楼使用的建筑材料也是红砖红瓦。这座楼尽管不高，但楼内装有电梯，室内装饰也比较考究，一律木地板，有的室内还铺着厚厚的地毯，较之历史研究所显得高级多了。《红旗》杂志在四楼办公，我们五人被安排用两间办公室，室内写字台、沙发椅、沙发一应俱全。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大字本的《参考消息》，而在历史所它只能在所级领导中传阅。也是在这里的电话号码簿上，我第一次知道中共中央有一个理论小组，组长是康生。到《红旗》杂志后，是戚本禹的助手张玉铭为我们安排了一切。安排停当后，戚本禹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我们。他说：“你们在历史所工作是很幸福的，因为尹达是历史学界的‘左派’。前几天《光明日报》的记者找我，问我史学界的情况，我告诉他，尹达是史学界的‘左派’，你可以找他了解。”接着他布置我们的工作，协助他编《毛泽东论历史科学》，可以利用中宣部、马列主义研究院等单位图书馆的一切资料，具体事宜找张玉铭解决。此后，我们就开始了工作。先拟订提纲，经几次反复，最后由戚本禹定下来。接着我们找来了毛泽东所有著作的版本，一篇一篇地读，按提纲要求将需要的资料抄录下来。戚本禹有时过问一下我们的工作，有时也就史学界的一些问题随便议论一番。有一次谈到项羽，他说：“史学界有人将项羽定为六国旧贵族的代表是没有道理的。他的出身是楚国旧贵族，但当时他是农民起义军统帅。项羽在新安坑降卒20万，错误严重，但也是出于农民对统治者的仇恨。你们同意我的观点吗？如同意，以后咱们一起写篇文章，让史学

界热闹热闹。”

一次，大概是我们到《红旗》工作十多天后，戚本禹让我们几个人到他的办公室去，我们进去时，他正打电话。他对对方说：“我看不要批了！”他放下电话，对我们几个说：“刚才我打电话给郇家驹，给田昌五讲情，要他们不要批田昌五了，让田写写批判文章么！”我对他说的话摸不着头脑。后来应永琛告诉我，1964到1965年的海阳“四清”结束后，历史所党组织对田在那里的“错误”进行批评，并做了组织结论。“文革”爆发后，田昌五在一次大会上说：“海阳‘四清’中的问题是刘导生搞的，怎么能算到我的头上？说我翻案，我就是要翻案！”我这才知道田对历史所党组织对他的批评耿耿于怀，此事大概不了了之。戚本禹与田昌五的关系一直不错，1967年江青的讲话稿《为人民立新功》发表后，因为其中涉及《战国策》上的一篇文章《触谗说赵太后》，戚就让田昌五将该文翻译成现代汉语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次戚见到我们，还提起这事说：“我那是让田昌五亮相么！”

1965年底，孙达人发表了批判“让步政策”的文章，在史学界引起轰动。1966年3月份，《光明日报》就“让步政策”问题组织了一次学术座谈会。当时北京史学界的名流如翦伯赞、吴晗、侯外庐等都参加了。戚本禹开完会回来，对我说：“在会上我看见你老师了，侯先生说他从没有讲过让步。翦伯赞看见我，赶过来要同我握手，我装作没看见，最近我还准备写批判他的文章呢。”第二天我看到《光明日报》发表的学术座谈会的纪要，已经感到巨大压力的翦伯赞在会上再也不敢阐述自己关于“让步政策”的观点，只是说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应该讨论。没过几天，戚本禹、林杰、阎长贵联名发表的批判翦伯赞的文章《翦伯赞的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应该批判》在《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同时刊出。我们最先看到了《光明日报》上的文章，并且都仔细读了。当天晚上，戚本禹没有回家。吃过晚饭，他同我们几个人一起在故宫和景山附近散步。我们不约而同地谈到那篇文章。戚说：“这篇文章写得有点粗糙，因为是几个晚上赶出来的，我们一边写，印刷厂一边排，看了三遍清样，就去找康老签字了，以后又送《光明日报》连夜发排，所以没有来得及仔细推敲。我还得向李斌成表示歉意，他也参加了写作，名字没出现。”我这才知道李斌成是这篇文章的撰稿者之一，还很为他没能在文章上署名抱不平。戚问我们对这篇文章的看法，我们当然都说好。我说：“整篇文章高屋建瓴，气势凌厉，翦想反驳都不敢。文中开头几句写得好：‘当今鼓吹资产阶级史学的挂帅人物，吴晗算一个，此帅之外，还有一帅，这就是翦伯赞。’”戚听了很感兴趣，问：“好在哪里？”我说：“这里的‘此’字用得对，一下子将翦给突出出来。如果将‘此’字换成‘这’字就平淡了。”

又过了几天，戚突然找我去他的办公室，说：“你去一趟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以《红旗》杂志记者的名义找宁可，问问他对批判历史主义的看法。”当天下午，我带着《红旗》杂志的介绍信乘公共汽车赶到北京师院历史系。系里看到我是《红旗》的记者，知道有来头。当时正是批判之火越烧越旺的时候，宁可的历史主义也在批判之列。该系的党总支书记接待了我，他说宁可参加“四清”还未回来，你们《红旗》对批判历史主义有什么看法？我明白他是在摸我的底，而戚只授权我了解情况，不能表态。就推说我只是来了解情况，至于历史主义应该怎么看，我也不清楚。他说宁可最近有点紧张，因为有不少批判文章涉及他。回来后，我将了解到的情况向戚作了汇报。戚说：“宁可的观点也不是全错，不过他将历史主义强调过头了。翦伯赞讲历史主义，理论上的论证不够，宁可对历史主义的论证就深入多了。”

又过了四五天，戚召集我们几个人询问工作进展情况，我们汇报查找资料的问题，谈话中，我说：“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我读到陈伯达同志的文章，他是比较早提让步政策的。”戚听了，立即严肃起来，说：“这事你不要向外谈。现在有人正抓这个问题，将‘左派’、‘右派’混在一起打，搅乱阵线，不要上他们的当！”我们中有人提到，照目前的批判，郭老和范老都有问题，也应该批判。戚说：“我告诉你们，郭老和范老不能批判，主席已经保了他们。”

大概从四月开始，戚就不来上班了，我们几次找他汇报工作都找不到人，问张玉铭，他也不知道。后来才知道他是到上海参加“五一六通知”通知的起草工作了。不久，我们就搬到西郊的西颐宾馆马列主义研究院继续工作。5月底，《毛泽东论历史科学》基本编纂完毕。正在此时，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发表，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夺回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其中以史学界的“东霸天”、“西霸天”影射批判范文澜、翦伯赞等人。我们这些被“极左”思潮激励起来的年轻人再也坐不住了，就向戚要求回所参加运动，戚同意，我们就于6月2日晚上回到历史所参加运动了。

回所后，我们看到历史所的运动已经热火朝天。年轻人都很兴奋。此前，已经有人贴出大字报，批判我的导师侯外庐，攻击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时我们对批判侯先生已经不满意，就又批判主持历史所工作的尹达，6月2日当晚贴出大字报，说他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谁知第二天风云突变，我们早上上班来到办公楼，就看到贴满了反击我们的大字报，说我们是“右派翻天”。此后几天，我们几个年轻人就遭到了大小会的批判。批判我们的理由是：尹达是历史学界的“左派”，历史所一直贯彻的是从陈伯达、康生那里来的红线。尹达又是中央文革的成员，反对他当然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了。但当时的形势却是造反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报刊电台都是一派鼓励造反的调子。而在历史所却是批判打击造反派，这当然使我们越来越不服气。7月16日深夜，傅崇兰、我、周绍泉、黄秉枢、栾成显、彭邦炯等六人在学部办公大楼门厅最显著的位置贴出大字报，揭露历史所发生的镇压造反派的事件。此事虽然在学部大院引起轰动，但我们几个人也立马引来更残酷的批斗，硬逼我们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最后我们都屈服了。傅崇兰又在一天深夜于学部大楼贴出大字报，检讨自己的错误。8月上旬一天下午约4点钟，我正在建国门外的宿舍里，历史所的秘书翟清福突然找到我，说有要事，即同我一起赶到学部大楼的潘梓年办公室。进门一看，我吓了一跳，里面坐着学部工作组组长张际春（时任国务院文办主任），还有关锋、戚本禹，另有曹轶欧（康生之妻）和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后两人我当时不认识。我立即想到，坏事了！肯定是有人将我的情况反映到戚本禹那里，他今天来肯定是批评我的。我僵在那里，不知所措，这时戚本禹大声说：“孟祥才这边坐，有人说我是他的后台！”他拍着靠近他的沙发，招呼我去坐。我见他对我的态度不错，心里稍稍宽慰了一点，就走过去，坐在了他的旁边。他小声问我：“受苦了？检讨了吗？”我说检讨了。他说：“检讨收回。你们造反是对的，重新起来给他们斗！”这时关锋与张际春商量了一下，关就开始讲话，大意是：据他们了解，这几天历史所发生了严重的镇压造反派的事件。今天他们几个人按陈伯达和康生的指示，到历史所为造反派平反。请张老为首的工作组协助做好工作。张际春检讨说他对历史所的运动关心不够，认为尹达是中央文革成员，他领导的单位不会有问题，结果是造反派受了镇压。他要求工作组转过来，一起做好善后工作。这时时间已到晚7时左右，关锋宣布晚上在历史所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要历史所有关人员负责通知，说完他们就到食堂吃饭去了。

当晚约8时，在历史所小礼堂召开了全体人员会议。关锋、戚本禹为代表的中央文革小组人员、张际春为首的学部工作组都出席了。会上，关锋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布为历史所的造反派平反，要求大家一起揭露郅家驹等人镇压造反派的罪行。他说郅是个坏人，解放初曾因倒卖黄金被处罚。由此，我们翻了身。通过批判“资反”路线，将对立面打垮了。不久，历史所成立文革小组，傅崇兰被选为文革小组的组长，我也被选为文革小组成员。从此，我们组的文革小组就与戚本禹拉上了关系，所有的工作都定时向他汇报。我们组的李斌成被戚调去做了秘书，这更方便了我们与戚的联系。9月初的一天上午，李斌成通知我们，今晚戚要来历史所与我们见面。我们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在会议室等到晚8时，戚来了，将车停在历史所办公楼的后面。他坐下，与大家认识后，说：“现在历史所是你们当权了，但不要走孤家寡人的道路，要团结大多数，批判‘资反’路线也不要过头。例如林甘泉这样的人就应该团结，他过去就写过一些好文章。”我们向他汇报了所里搞运动的情况，其中谈到顾颉刚，问他应该怎么定性，戚说：“顾好办，就凭他攻击鲁迅，也该打倒。”我们又问尹达怎么定性，戚说：“也就是路线错误，在他

的问题上，不要为之过甚。”这时戚笑笑说：“我过去认为尹达学问很大，通过前一阶段的接触，我才知道他的学问一般，有时也信口开河。比如，有一次，他硬说赛金花还活着，就住在天桥附近。”

1966年底，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戚本禹就布置我们搜罗全国有代表性的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选编后送中央文革。我们派人出差全国各地，征集批刘大字报，后来出了两个集子。

还是在1966年底，戚本禹将陈里宁交到历史所，说他是最早反刘少奇的英雄。原来陈是湖南人，“文革”前因为写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被当时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批准逮捕，判刑后发往新疆劳改。后发现他精神有问题，就让他到安定医院就医。为他治疗的大夫叫金宏敏。在治疗过程中，“文革”开始了，反刘少奇成了大方向。金大夫于是与清华大学的造反派一起向中央文革反映了陈里宁的问题。陈伯达、康生、戚本禹立即决定给他平反，将其树为反刘少奇的英雄。戚指示，陈里宁由傅崇兰直接负责，让他作为历史所的工作人员专门写批判刘少奇的文章。陈里宁在历史所每天接待来访，不时外出作报告，还经常写文章，成了当时的大名人。1967年初，在全国性的大批判浪潮中，《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的一个编辑找到陈里宁，要他写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他很快拿出了一篇自我吹嘘的文章，那位编辑看后对我说不能用，并说就陈里宁的水平，很难写出可以发表的文章，他要求我找人为他写一篇文章由该报发表。我找了历史所的一位年轻的研究人员为陈里宁写了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在5月份的《文汇报》上发表了。后来，陈里宁要求补发他在服刑期间的工资，我们给戚打报告请示，未批准。再后来，陈里宁写的批判文章越来越不像样，胡诌八扯，像一个精神病人的胡话。接着，有人揭露陈里宁不仅反刘少奇，而且反毛主席。我们又找金大夫和清华造反派了解情况，他们仍坚持陈里宁是反刘少奇的英雄。我们打报告给戚，戚指示让陈里宁以《光明日报》记者的身份到农村搞调查，不要再外出作报告。此后，继续有人，包括当时参与审判陈里宁的公安人员揭露陈里宁的反毛主席的行为。这时，陈里宁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在当时可是篡改毛主席著作的大问题。当傅崇兰指出他的问题时，他竟说自己没有任何问题。我们考虑必须再给戚打一个报告说明陈里宁的问题，否则我们摆脱不了干系。在我们的报告送上去不久，戚便要我们重新将陈里宁送到公安部，这已是1967年的秋天了。

1967年初，戚本禹正在写批判刘少奇的大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清宫秘史〉》。该文的初稿清样曾送给傅崇兰提意见，我与张显清、周绍泉都看过，我不记得提过什么修改意见。这篇文章的发表掀起了批判刘少奇的高潮。大概是4月的某天上午，戚在全国政协礼堂的一个会议室里召开了一个部署大批判的会议，到会的有二三十人，现在记得的有学部的吴传启、林聿时，《光明日报》的穆欣、詹铭新等，我与傅崇兰也参加了。这天，戚穿了一身军装，神采飞扬。落座后，他说：“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大批判，可是不少报刊跟不上，老是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必须将这个形势扭转过来，大家都写文章。吴传启、林聿时，还有傅崇兰，你们都赶快亮相！”说到这里，吴传启接话说：“哎呀，我早就亮了不少时间了！”吴传启这里说的是学部中我们的对立面“红卫兵总队”满北京贴大字报、小字报揭露他反对大跃进，他最精彩的一句话是：“裤子都赔光了，还有什么政治！”吴传启坚决不承认他说过这句话。这次会议之后，我们也在所里布置写大批判的文章。此后，我在《人民日报》用“史红兵”的笔名发表过一篇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文章，还给《光明日报》写过纪念五四运动和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发表若干周年的社论。

这期间，我们所的对立面几次与我们发生冲突。为此，我们要求戚来所里听听我们的汇报。戚在一天晚上来了，当我们汇报到所里有人为尹达评功摆好，攻击“文革”时，戚说，你们要沉得住气，有些人要闹就让他闹，到时候让康老或伯达同志出来讲一句话，他们就垮了。这时戚举起手，伸着小拇指说：“康老和伯达同志只要动动小拇指，他们就完了。”

大概是5月份，一天李斌成打电话给傅崇兰，说戚要我们历史所组织一些人查找有关资料，看看外国历史上有没有“文化大革命”的事。傅要我负责找人查一下，我就找了懂外文的黄巨兴、张书生、何兆武、林甘泉等人，让他们分别查查欧美和苏联的材料。大约过了十多天，他们就将有关材料编好送到我那里。我印象最深的是黄巨兴编辑的有关美国独立战争后进行所谓“文化革命”的材料和林甘泉编辑的有关苏联十月革命后所谓“文化革命”的材料。我将这些材料稍加整理就送给了戚。不久戚来电话，说材料搞得不错，还表扬我们用林甘泉参与这一工作。说：“人家林甘泉有一技之长，你们就该发挥他的作用么！”

1967年6月份的一天，学部我们这一派组织了一次批判刘少奇的大会。不知道谁通过什么关系找来了刘少奇的前夫人王健，让她在会上发言揭露批判刘少奇。这次会开得声势很大，吸引了不少人，我们很得意。谁知没过几天，戚本禹就打来电话，怒斥傅崇兰：“你们怎么将王健请到台上揭露刘少奇？纯粹是帮倒忙！刘的问题主要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夫妻关系是私生活问题，你们搞这些问题就是干扰斗争大方向。”

1967年六七月份，由中央文革直接或间接指挥的造反行动越来越猛烈。大概是6月份的某天下午，傅崇兰高兴而又神秘地告诉我：“戚本禹让我们今天下午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去，指名要有关刘少奇的材料，他们不给，我们就说他们窝藏刘少奇的黑材料，是包庇刘少奇，同他们大吵一气。然后就在今天晚上到他们门前贴大字报。搞成一个让北京都知道的事件，到时候请戚本禹出来讲话支持我们，他们就得乖乖地将材料交出来。我刚刚与张德信一起去了历史博物馆，他们当然不知道我们的背景，不肯拿出材料。我们就与他们吵了一架，被赶了出来。吃过晚饭，我们就去历史博物馆门前贴大字报。”晚饭后，我们十多个人带着纸、墨、笔和浆糊，蹬着一辆三轮车来到历史博物馆的北门前，遂即在地上刷上了大标语：“历博一小撮窝藏刘少奇黑材料，包庇刘少奇罪该万死！”“历博一小撮包庇刘少奇没有好下场！”又在几张纸上写了揭露历博拒不交出所谓刘少奇黑材料的情况。历博的北门紧靠长安街，人来人往，有不少人停下来看我们所贴的大字报的内容，也有人问我们是怎么回事。我们当时很得意，就告诉他们说等着看热闹吧。第二天早晨，我们又赶到历博门口，看他们如何反应。只见他们在我们刷的大标语旁边也刷上了大标语：“历史所一小撮冲击历博罪该万死！”“历史所一小撮企图窃取刘少奇黑材料，包庇刘少奇罪该万死！”此后，我们天天等着戚本禹表态支持我们，但他却一直没有出来表态。过了几天，我问傅崇兰戚为什么不表态？傅说：“可能他遇到难处，不便表态。我们也不好问他。”此事不了了之。戚本禹在这桩事件上为什么虎头蛇尾，我至今也不明白。

1967年夏天大破“四旧”的时候，红卫兵从一些知识分子家中搜出了大量线装书，除了当场烧掉的以外，大部分都送到了造纸厂作为重新造纸的原料。我们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就给戚本禹写了一个报告，希望抢救其中有价值的图书。戚要求我们以历史所文革小组的名义给中央文革打一个报告，说明抢救这批图书的重要性，然后由陈伯达或康生做一个批示，我们就可以派人到造纸厂挑拣图书了。我们的报告上去后，陈伯达很快做了批示，要求历史所负责抢救送到造纸厂的图书，并批准将东总部胡同的一处闲置房屋交给历史所，作为存放图书的用房。此后，我们带着陈的批示到东郊造纸厂，该厂看了陈的批示，同意我们派人到那里任意挑拣图书。我们于是派张政烺先生等版本目录学方面的专家坐镇北京几个造纸厂，抢救了一批珍贵的图书。

大约在1967年的5月份，戚本禹又指示我们组织一个小组，就全国将来的工资改革搞一个方案。接着中央文革就派原在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过的刘士才和两位福州部队的同志来历史所与我们一起工作。所里指定我负责这个小组的工作，并调来近代史所的耿云志参加这一工作。小组成立后，我们带着中央文革小组的介绍信，到当时的劳动部和国务院人事局调阅有关工资问题的资料，受到热情的接待。几乎所有的档案资料都对我们开放，我们挑了部分资料带

回作为参考。按照戚的指示，我们小组最后要交出两份材料：一份是对我国现行工资制度的估计和工资改革的必要性与指导原则，一份是工资改革方案，主要是设计工资级别和与之对应的工资金额。在讨论对我国现行工资制度估计时，我们内部就发生了分歧。我，还有刘士才等人抓住毛主席的话“中国现行工资制度，一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一是老祖宗留下的”，主张全盘否定。耿云志则认为现行工资制度基本符合按劳分配原则但有缺点。争论的结果是同意我与刘士才的意见。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我们拿出了两份材料。记得工资改革方案设计了10个级别，从1级的200元到10级的30元。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工资没动，仍是56元，这是根据戚的意见设计的。这两份材料搞好后，我们就上呈中央文革了。不久，我看到了这两份文件的铅印件。无疑我们设计的工资改革方案是“极左”思想指导的产物，但在“文革”中，它仅仅是停留在纸面上，并没有付诸实行。

1967年六七月份，由于中央文革许多行动不得人心，不少地方出现了批判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的大字报，涉及王力和关锋的尤多。7月18日晚上，在中央宣传部小礼堂，中央文革召开了有部分北京市造反派头头参加的会议。我记得到会的有北京造反派舞台上的所谓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历史所的傅崇兰和我，以及中央文革的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都参加了。总共一百多人。会议由戚主持，先是几位造反派的代表发言。现在我只记得蒯大富发言时说现在社会上保守派很活跃，造反派处于受压的状态。造反派的代表发言后，张春桥讲话，他大讲“文革”的大好形势，说蒯大富你一年前是反革命，被关押监禁，现在你能自由地来这里开会，这个变化多大呀。张讲话后，戚开始讲。他一方面讲“文革”的大好形势，一方面讲被打倒的走资派、反动权威不甘心失败，伺机反扑。说彭德怀天天打太极拳，就是要练好身体，与无产阶级斗争到底。最后，他指着关锋说：“现在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包括一些造反派，反对关锋。我今天给他讲讲情，你看关锋这么瘦，你们反他干什么？”1978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戚本禹时，还派人找傅崇兰取证这次会议的材料。

1967年8月份，一些过激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造成重大的外交事件。毛主席下令将王力、关锋隔离审查。江青、陈伯达、康生立即出来大骂王力、关锋是隐藏在中央文革的“变色龙”和“小爬虫”，宣扬他们一贯与王、关作斗争。据说上边一开始是准备将戚本禹与王、关同时端出来，是毛主席暂时将戚与王、关分割开来，以观后效。由于王、关被端出来，学部与其有密切联系的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为首的“红卫兵联队”一派就垮了台。由于我们名为“大批判指挥部”的一派是从“联队”一派分化出来的，而戚本禹又仍在露面，所以我们这一派暂时占了上风。不过，学部已经有人怀疑戚本禹，连带及我们一派。当时学部形势比较混乱，我们一派也不能统一起來。看到戚没有垮台，我们很高兴，就给他写了一个报告，要求他设法接见我们一次，为我们一派撑腰打气，以壮大我们一派的声势。10月初的一个下午，戚通知说要在北京市委的一个会议室接见学部的代表。为了显示公正，代表中有学部除“联队”外的各派的头头。戚与谢富治一起出面接见，主要是戚讲话。他说现在社会上有股歪风，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呢？就是毛主席、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副总理等人。谢接话说，戚本禹你也是。戚说我除外，谢说你不能除外。两人还争论了几句。接着戚以讲学部文革史为名，说明学部文革的正确路线代表是以傅崇兰为首的我们这一派。说到这里，学部哲学所的马泽民起来质问戚，问他前几天还同王力和关锋一起活动，说一样的话，这怎么解释？戚说，那是领导的安排。马又提别的问题，搞得戚很被动，戚与谢在一片争论声中退场。会后，我们一派自然很得意，立即将戚的讲话整理打印，广为散发，并组织学习。其实，我们并不了解，此时的戚已经处于泥菩萨过河的危殆境地。

学部的“联队”垮台后，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有的被逮捕，有的被群众组织专政，但潘梓年和吴传启却不知去向。周总理指示戚本禹通过傅崇兰派人协助二炮保卫部追捕这

两个人。不久，吴传启在南阳落网。据协助二炮保卫部抓捕吴的赵国华后来告诉我，他同二炮的一位参谋根据线人提供的线索飞到南阳，在一个小旅馆找到吴，吴用的是化名。当那位参谋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他坚决否认自己是吴传启，并出示假工作证抵赖。这时，赵国华出现在他的面前，问他：“吴传启，你认识我么！”吴只得乖乖地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当晚，赵协助那位参谋乘飞机将吴押至北京。潘梓年是江苏宜兴人，他通过关系躲到太湖的一个小岛上。傅崇兰指派哲学所的一位同志协助二炮保卫部的人乘海军提供的快艇将其抓获。

1968年初，我们同戚本禹失去电话联系。这使我们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惊恐不安，只得通过各种关系打探戚的情况。因为傅崇兰与李讷有一面之识，我们搞的有关“文革”的材料也曾送给她。我看过傅保存的李讷用铅笔写的一张条子。当时李在《解放军报》任“文革”组长。傅同她没有电话联系，就在一天深夜要我陪他去《解放军报》社找李讷。我们到了那里，只见到她的副手，他客气地答应为我们联系，却没有下文，估计他已得到李的指示，故意敷衍我们。傅又找到二炮保卫部，一位副部长接待了他，也是很客气地敷衍一番，说我们的合作已经完成，在学部实现大联合以前不要再同他们联系。面对当前的严峻形势，我们一派的主要骨干开了几次形势分析会。后来成为大经济学家的吴敬琏当时是我们这一派的专案组长，他分析说，戚的突然消失无非出于两种可能，一是他确有问题，垮了；二是他没有问题，上边故意不让他出面，而让反他的人表演表演。第一种可能最大，因此我们应该做好应变的准备。大家都同意他的分析。这时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我们的对立面“总队”反对我们的声势越来越大，不少所的权被他们夺去，历史所也是如此。此前，《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艾玲对傅崇兰说，形势对你们不利，我看你还是躲一躲。但傅认为自己没有问题，哪里也不去躲，结果在一天下午被“总队”与地质学院的造反派串通一气抓了去。那天下午我们几个人正在办公室，突然闯进一伙人，不由分说将傅抬起，从二楼拖到楼下，塞进一辆汽车开走了。我们抓住地院的一个人，并将他扭送卫戍区。卫戍区的一个参谋接待我们，待我们说明来意，他无意说了一句话：“噢，你们是傅崇兰一伙的。”接着说，地院这个人交给我们，你们回去等消息吧。与戚本禹的联系虽然中断，但我们这一派当时仍坚持认为我们大方向正确，决心斗争到底，誓不屈服。大家最关心的是傅崇兰的安全和去向。他被对立面抓去，肯定受到非人的待遇，但只要专政机关不接受他，就说明他没有问题。只要他在“总队”那里坚决斗争，我们一派团结一致不动摇，我们的团体就会生存下去。由于我们在各所的权力都被对立面夺去，我们这些头头的安全也受到威胁；在傅被抓去后的几天里，我们就天天在外面流浪。为了鼓舞士气，我们通知各所同派的人在一天上午到北海五龙亭开会。同时，我们也得到消息，“总队”要在同一天召开大会，扭送傅到卫戍区。我们一面派人到“总队”召开的会议上打听消息，一面按时在五龙亭召开了同派的会议。记得那天天气寒冷，昔日熙来攘往的北海也冷冷清清。在会上，我们这派的头头张德信、吴元迈等讲了话，无非是论证我们一派的正确性，鼓励大家坚持到底。同时宣布，在傅崇兰失去自由期间，由孟祥才代理我们这一派历史所的头头。我也在会上表态，坚决同大家一起战斗到底。会还没有开完，我们派去打探消息的人回来报告，傅已被扭送卫戍区。我们立即向大家宣布了这个消息，同时表明无论傅有什么问题，我们都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由于傅被卫戍区接收，我们这一派中的不少人纷纷反戈一击，我们这一派也就基本垮台了。

□ 选自《历史学家茶座·第10辑》，王兆成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

## 【回首文革】

“文革”前夕的《人民日报》

• 钱 江 •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五

一六通知》的内容和林彪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部分内容向全国传播，号召群众起来“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这篇社论是前一天赶来《人民日报》夺权的陈伯达一手炮制的。由于《人民日报》社论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这篇社论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动乱。然而，这里有一个前提，原先深受毛泽东器重的《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吴冷西为什么成了“陈伯达扫帚”下的灰尘？为什么在掀起“文革”狂潮的理论批判中，上海《文汇报》抢了《人民日报》的风头？本文揭示了其中“风起于青萍之末”的由来。

#### ◇ 为什么拖延转载《评〈海瑞罢官〉》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姚文元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但是，以吴冷西为总编辑的《人民日报》在20天内予以抵制，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中央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不知道姚文元文章的背景，更不满意姚文元文章的强词夺理，故以不同方式拖延。但是，姚文元文章引起了彭真等人的不安是肯定的。11月13日，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宣传部长李琪与《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等人会商后，向上海《文汇报》了解《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背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指示，不向北京透露。邓拓等人没有获得多少“背景”情况，遂将情况报告了彭真，决定《北京日报》不转载姚文元文章。这个情况，吴冷西是知道的。

《人民日报》社内部，有不少人看出姚文元文章大有来头，认为要予以转载。这其中包括新任副总编辑李庄，他看了姚文元文章，“迷迷糊糊感到要出什么大事了”。其他编辑也有这个感觉，觉得好像应该转载，又怕承担不起责任，都来请示总编辑吴冷西。

吴冷西答复说，他要请示中央。吴冷西请示了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兼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彭真。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早在1964年7月2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时决定成立的，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成员是3个人：康生、周扬、吴冷西。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任务就是领导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批判”运动。这样，从1964年7月以后，从文艺领域批判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和京剧《李慧娘》开始，批判的风潮逐渐扩大到其它意识形态领域。彭真和吴冷西本来都是“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起草和定稿人员，如今又有了这个“小组”的工作关系，相互往来就更多了。

彭真不同意姚文元文章，而且为上海发表此文而恼火，在吴冷西请示的时候，就要求不予转载。但在这个时候，吴冷西没有像以往那样另辟蹊径，直接向毛泽东请示。为什么？或许是因为他已经感觉到，毛泽东和他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本来，是否转载姚文元文章，吴冷西想同时请示邓小平和彭真，但这时邓小平去了西南三线视察。这样，转载姚文元文章的事拖了下来。但是，在姚文元文章刊出之后的3周时间里，华东各省报转载了姚文元文章，显出了几分热闹。可在北方，尤其是在报纸最集中的北京，却没有一家报纸转载姚文元文章。南热北冷，一时形成对照。

11月27日，周恩来从上海回到北京，带来了毛泽东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文章的严重不满，通知转载。



28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邓拓、周扬、许立群、姚臻等人开会，决定转载姚文元文章。邓拓汇报说：吴晗很紧张。彭真回答：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并决定由吴冷西通知北京各大报纸，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11月29日夜，吴冷西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社编辑部，说中央决定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并排定29日《北京日报》转载，30日《人民日报》转载，12月1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等其它报纸转载。吴冷西还说，转载姚文元文章后，要根据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开展学术讨论。

接下来，吴冷西亲自主持起草转载姚文元文章的编者按语，指出如何对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评价问题，多年来没有得到正确解决，需要系统地进行辩论，要以理服人，并强调有批评的自由，也有反批评的自由。这个按语把评《海瑞罢官》放在学术范围内，提出“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在报纸上展开一次辩论”，“既允许批评的自由，也允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按语引用毛泽东的话：“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吴冷西将这个按语报请周恩来和彭真审阅后，置于姚文元文章之前，刊登在11月30日的《人民日报》第5版“学术研究”专栏。《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文章后，除华东地区省报外，各地省（区）党报纷纷转载了姚文元文章，都同时转载了《人民日报》的按语。

吴冷西没有想到，《解放军报》并没有按规定的日期转载，而是抢在11月29日提前一天将姚文元文章刊出，并在编者按语中径直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这就为《海瑞罢官》定了性。这个调子与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文章前的按语是大相径庭的。

#### ◇ 《二月提纲》起风波

对姚文元的文章，最反感的当属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转载了姚文元文章之后，邓拓在北京市委的会议上几次表态说：“这次讨论，要在学术界造成一个好的风气。就是真正照《北京日报》‘编者按’那样搞，贯彻‘双百’方针，实事求是地辨明是非。文章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取胜。要让人家说话，不要一边倒。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过火的批评要纠正，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11月30日，邓拓召开高等院校会议，以《北京日报》编者按为准，对《海瑞罢官》展开学术讨论。

12月3日，中宣部召开了首都各报刊负责人会议。吴冷西传达彭真关于“学术讨论”的意见。吴冷西说，姚文元的文章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学术问题，一个是政治问题。两个问题都可以讨论。估计政治问题不可能发表很多文章，主要放在学术问题上讨论。通过讨论，要学术界造成贯彻“双百”方针的空气。吴冷西强调，在讨论中，批评吴晗的文章可以发，批评姚文元的文章也可以发。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方针，正面反面文章都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骂街。

12月15日，《人民日报》在第5版刊出《海瑞罢官问题的各种意见的简介》，摘录了各地报刊讨论中的不同意见，有赞成姚文元文章的，也有赞成吴晗的，虽然将赞同姚文元文章的意见排在前面，与反对意见的比例却近乎一半对一半。阅读起来，反对意见更理性，更有说服力。

12月25日，吴冷西得知《北京日报》27日要发表吴晗的长篇检讨，即要《人民日报》编辑部于同日发表一篇有分量的批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他要报纸刊登署名“方求”的文章

《〈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结果，这篇大半版长文于12月29日发表时临时加上了一个后记：“这篇文章完稿后，我们读到了吴晗同志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我们准备在详细研究吴晗同志这篇文章以后，和学术界的同志们一道，进一步同他进行讨论。”这显然是为将来留一个后路，为争取主动留下一点余地。12月30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专栏（第5版）转载了吴晗的“自我批评”文章。

谁能料想，这又是吴冷西布下的一着险棋。主持起草和最后修改定稿“方求”文章的不是别人，正是即将大祸临头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以今天的眼光看去，“方求”文章的论点显然存在问题，文中的批判是偏颇的。但是，文章仍然将“讨论”限定在“学术”范围内，《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将文章发表在“学术研究”版上，仍然暗含着对姚文元“上纲”做法的抵制。

进入1966年，《人民日报》继续刊登对姚文元文章的辩论文章。主要编辑事务工作由报社的理论宣传部进行，部主任是何匡，副主任有沙英、王泽民。理论组组长是王若水，主要负责对有关“海瑞罢官”来稿的处理。他们都盼望着得到来自中央的信息。

1月2日，刚刚从上海回到北京的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委和部队的有关负责人开会，由胡绳传达了毛泽东12月21日的讲话。随后彭真讲话，他说，《北京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按语写得不那么凶，而军报直接点出《海瑞罢官》是大毒草，是对的。但是这样一来，就使得人们不敢说话了。

彭真检讨自己说，主席批评我们懒，我们的同志总要学习些知识才行。这场争论，要扯多宽就扯多宽，要扯多久就扯多久。

彭真还说：“任何人的文章都可以一分为二。我在上海讲，你《解放日报》、《文汇报》自己也发表了不少错误文章，也应该清理清理。”这时周扬插话：“《解放日报》推荐《海瑞上疏》是加了按语的。”彭真接住话头说：“对于他们的错误，中央报纸也可以批评。”

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中宣部长陆定一说，就这次的讨论方法上来说，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搞。一扯到政治问题，讨论就展不开。陆定一还说：“当前这场讨论，是学术性的。社会科学、文学方面的问题多得很。对古人的评价，历史主义，现实主义，形象思维，美学，一个题目一个题目的来。解决这些问题，要一二百年。”

彭真和陆定一的发言，都是针对姚文元文章的，暗含着反对姚文元文章无限上纲，将《海瑞罢官》政治化的做法。这也是对毛泽东支持《海瑞罢官》的抵制。由于参加会议的人很多，彭真、陆定一的讲话都会给自身带来危险。

康生发言了，他说，日前（12月27日）吴晗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自我批评实际上是“自我批准”、“自我开脱”，“他的要害是‘罢官’”。

在这天的会议上发言的还有田家英、周扬、许立群等人。他们各抒己见，未见有针锋相对的交锋。

吴冷西参加了会议，《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陈浚也与会了，没有发言。但是，对彭真、陆定一、周扬那些抵制姚文元文章的话，他们并没有通过自己的渠道向毛泽东反映。根据会议的参加者——《光明日报》社总编辑穆欣事后回忆：这次的会议是重要的，参加人数众多，会议定下的基调是将评论姚文元文章和《海瑞罢官》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这就与毛泽东的意图背道而驰了。

1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组读者来信,前3篇赞成姚文元文章,后两篇反对姚文元文章。反对的文章为《〈海瑞罢官〉有革命性》、《〈海瑞罢官〉不是毒草》。后者批评姚文元说:“为什么吴晗同志作这样的自我批评呢?这因为,最近有许多报刊接二连三地登载了批评和指责他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他才不得已而为之。”2月3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文章《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质疑》,更是直率地说:“姚文元同志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把自己的主观臆断说成剧作者的主观意旨,恐怕不是无产阶级应有的严肃的科学的战斗的态度吧。”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出来的反对者意见虽然少些,版面位置也不那么突出,但文章的说服力却更强。

毛泽东不愿意看到对姚文元文章的众多批评意见,而且是切中姚文元文章要害的文章。此前的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来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峰和田家英谈话。谈话从上午9时持续到12时。毛泽东谈到了前些天戚本禹在《红旗》杂志发表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泽东这段谈话没有像以前那样很快传到吴冷西那里。《人民日报》仍继续按学术问题开展讨论。

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文化革命小组”扩大会议,研究成立学术批判办公室,除“五人小组”外,还吸收王力、胡绳、姚溱、许立群和邓拓参加。会议认为要把当前的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要降温,要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确定由姚溱和许立群起草向政治局常委的汇报提纲。

第二天,姚溱和许立群在钓鱼台起草汇报提纲。吴冷西没有参加这个文件的起草。但是他参加了2月5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德、彭真、康生等参加的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委员们讨论了这个提纲,同意在学术讨论中不涉及庐山会议,并要“五人小组”去武昌,向正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因此,对这个提纲,吴冷西甚为知情。

2月6日,吴冷西召集《人民日报》社编委会主要成员开会,向大家传达提纲内容。吴冷西说:“中央为了加强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准备了一个系统意见,对学术讨论已有明确方针:一放,二先破后立,三反对左派学阀用政治帽子以势压人,四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学术讨论要以理服人。”他还说,“提纲已经中央通过,一两天内要去武汉向毛主席报告”。

果然,2月8日,吴冷西作为成员之一来到武昌,从机场直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听了这个汇报后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彭真马上回答:“经过调查,不是。”

毛泽东说:“我曾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

彭真说:“2月5日,我们在北京向少奇同志汇报的时候,也提到您的话。少奇同志说,没有发现吴晗跟彭德怀有组织联系……”

彭真的话柔中有刚,和毛泽东的话顶牛。说话时吴冷西在场。

按说，以吴冷西的敏锐，他完全应该察觉，毛泽东已经挑明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政治性文章而不是学术性论文，姚文元文章弹响了大风暴的前奏曲。

可是吴冷西又觉得，毛泽东没有对汇报提纲提出不同意见，最后还是同意由彭真代表书记处于2月12日向全党发出这个提纲，这就是《二月提纲》的由来。

从武昌归来，在吴冷西主持下，《人民日报》继续以《二月提纲》为指针，对《海瑞罢官》展开学术讨论。从2月到3月底，《人民日报》发表了《〈海瑞罢官〉的艺术表演错在哪里？》、《对〈海瑞罢官〉剧质疑》、《〈海瑞罢官〉有积极意义》、《对批判〈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等一批学术文章。讨论的范围已不再限于《海瑞罢官》，还发表了《田汉的〈谢瑶环〉是一株大毒草》、《评〈谢瑶环〉》、《翦伯赞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夏衍同志的资产阶级思想》等。编辑部门内，许多人觉得《人民日报》正在扭转被动局面，跟上了形势。按吴冷西本人的话则是：“《人民日报》还是按照《二月提纲》的精神组织学术讨论，凡是涉及庐山会议的文章都要被删改或不发。”这就违背了毛泽东支持姚文元文章的意图。

在如何看待姚文元文章的立场上，吴冷西和彭真完全合拍。相反，吴冷西与江青却是不合拍的。1966年初的两三个月中，吴冷西来往于北京和南方毛泽东暂住处，曾在火车上与江青同行，说起过要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为什么不找《人民日报》社的写手？江青即“口气严厉”地表示对《人民日报》社青年文艺评论家“思想状态”的不满。吴冷西没有继续与她谈下去。

1966年2月就这样过去了，吴冷西继续主持《人民日报》、新华社的全面工作，担负领导首都各报的宣传任务（虽然他对《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已经管不住了）。他严格遵照刘少奇、彭真等一线领导的指示，亦步亦趋地控制着对姚文元文章的宣传，终于使毛泽东感到，他当年选中的“政治家办报”的好手，现在不那么听话了。

#### ◇ 毛泽东严厉批评吴冷西

1966年3月18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但是，到会的常委只有刘少奇和周恩来，没有过半数。会议议题中有中央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等。本来，在京常委会议已经议定，中央应派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但是毛泽东否定了大家的意见。

毛泽东措辞严厉地说：“去年9、10月份，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我的意见，还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派。”

3月18日下午，毛泽东还在西湖边刘庄召开了一个小会，参加者有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康生、陈伯达，吴冷西列席。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突然转向吴冷西，批评说：“《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我过去批评你们不搞理论，从报纸创办起就批评，批评过多次。我说过我学蒋介石，他不看《中央日报》，我也不看《人民日报》，因为没有什么看头。你们的‘学术研究’是我逼出来的。我看你是半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我对一些没有希望的人从来不批评。”

毛泽东又说，你们的编辑也不高明，登了那么多坏东西，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不犯错误的报纸是没有的。《人民日报》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可能以后还会犯错误，说从此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错了就改，改了就好。《人民日报》还是有进步，现在比过去好，我经常看。但要不断进步。

吴冷西顿时感到心情沉重。约在10年前，正是毛泽东派他到《人民日报》，去接替犯了错误的邓拓的。现在邓拓已到朝不保夕的地步，而邓拓的继任者也已经岌岌可危！

毛泽东的这顿批评不仅前后有矛盾的地方，若是和他以前多次表扬《人民日报》和吴冷西的讲话相联系，更是彼此抵触。

但是此时的吴冷西不敢分辩。从会议厅里出来，吴冷西对周恩来说：“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

周恩来对吴冷西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回到下榻的西泠饭店，吴冷西把自己的想法对彭真说了。彭真也对他说：“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这时的吴冷西心中一激，“隐约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 《湘潮》2008年第4期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